

<<18世纪中国文化在西欧的传播及>>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18世纪中国文化在西欧的传播及其反应>>

13位ISBN编号：9787810830027

10位ISBN编号：7810830023

出版时间：2002年1月

出版时间：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作者：严建强

页数：393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18世纪中国文化在西欧的传播及>>

前言

全球一体化进程为我们审视17、18世纪中国与欧洲的文化交往提供了新的视角。当我们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深切感受到多元文化碰撞和互渗在人类文明发展中的作用。或许正是这样一种意识，使得该研究领域备受关注，它所包含的两个方向“‘中国热’中的欧洲”和“欧洲在中国”都取得了重要的进展。

从学术史的角度看，本书所关注的前一方向似乎更多受到来自意识形态和国际政治格局的制约。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相对和平时期，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西方学者、中国学者和日本学者都有活跃的学术表现，出版专著的数量为此后三十年间著述总数的一倍以上。

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期间这一领域的研究进入低谷，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东方，整个20世纪50年代几乎看不到任何有分量的著作问世，直到20世纪60年代开始才出现复苏的迹象，著述数量逐渐增加。从1974年开始，在法国尚蒂伊多学科研究中心[centre de Recherches interdisciplinaire de Chantilly]每三年召开一次有法国、德国、比利时、意大利等国中国问题专家参加的国际汉学讨论会，“中国文化对西方的影响”是会议的基本议题之一，例如前几次会议的主题都涉及到“17—18世纪中国同欧洲(主要是同法国及其他主要国家)的交往关系，尤其是中国对它们的影响”，包括“哲学影响”、“来自中国的艺术和科学”和“礼仪之争”等方面。

1其他类似的国际会议也时有举行。

进入90年代，该领域研究呈现出繁荣景象。

在欧洲和美国有一批重要的著作问世，所涉及的内容无论在专题分析方面，还是在综合性的研究方面，都有重要的突破。

2更具有意义的是，研究中西关系史的中国学者开始改变原先主要局限于“西学东渐”研究的局面，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涉足“中学西被”的领域。

我们知道，在中国，长期以来对“中国文化对西方的影响”或“中学西被”这一方向的课题很少有人问津，与“西学东渐”的研究相比，无论参加的人数，还是研究的成果都要少得多。

例如，在关于欧洲社会的“中国热”以及18世纪欧洲盛行的“中国风”，西方已经出版了四五种名为《中国风》[Chinoiserie]的著作，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探讨中国艺术风格对18世纪欧洲艺术和社会生活的影响。

而在中国，一直到现在都不曾有部这方面的专著。

这种状况不仅与西方汉学界在该领域取得的成就不成比例，而且也与历史上中国文化对欧洲乃至世界的贡献不相称。

造成这种现象也有资料方面的原因，因为该方向的研究，无论文献资料还是实物资料，都主要集中在西方的档案馆、博物馆和图书馆；文献资料所涉及的语言包括拉丁语、葡萄牙语、西班牙语、法语、英语、德语和意大利语等，而且非常分散。

这给中国学者的研究带来很大困难。

早期从事这一方面研究的多为在欧洲的留学人员，如范存忠、陈受颐、李肇义、陈铨、钱钟书等，文章大多用外文写成。

随着70年代中国实行开放政策，中国学者开始有机会到各国的图书馆、档案馆查阅资料，到博物馆观看实物，部分重要的西文原始材料和近人的研究成果也陆续翻译出版。

同时，随着开放意识的加强和全球一体化进程中对多元文化格局的重视，社会公众和学者对文化间交流的重要性有了更明确的认识，这些都给该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机会。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对“中学西渐”或“中国文化对欧洲之影响”的研究给予了越来越多的重视，在多方面取得了重要的进展，逐渐成为学术界的热点。

这十年间所出版的著作比此前所有著述的总和还要多1，同时有关论文的数量猛增，并出现了多种专门性的刊物。

<<18世纪中国文化在西欧的传播及>>

内容概要

《18世纪中国文化在西欧的传播及其反应》所关注的前一方向似乎更多受到来自意识形态和国际政治格局的制约。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相对和平时期，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西方学者、中国学者和日本学者都有活跃的学术表现，出版专著的数量为此后三十年间著述总数的一倍以上。

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期间这一领域的研究进入低谷，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东方，整个20世纪50年代几乎看不到任何有分量的著作问世，直到20世纪60年代开始才出现复苏的迹象，著述数量逐渐增加。从1974年开始，在法国尚蒂伊多学科研究中心[centre de Recherchesinterdisciplinaire de chantilly]每三年召开一次有法国、德国、比利时、意大利等国中国问题专家参加的国际汉学讨论会，“中国文化对西方的影响”是会议的基本议题之一，例如前几次会议的主题都涉及到“17—18世纪中国同欧洲(主要是同法国及其他主要国家)的交往关系，尤其是中国对它们的影响”，包括“哲学影响”、“来自中国的艺术和科学”和“礼仪之争”等方面。

1其他类似的国际会议也时有举行。

<<18世纪中国文化在西欧的传播及>>

书籍目录

绪论上编：中国文化在欧洲的传播与18世纪西欧“中国热”第一章 中国图像的变迁：从古典时代到新航路开辟1一、丝绸之路与古典欧洲的中国图像二、马可·波罗时代的中国图像第二章 大航海以来欧洲对华贸易与中国报道一、欧洲对华贸易与中国物质文化西传二、17世纪前葡萄牙文和西班牙文中国报道三、17、18世纪来自商人和使节的中国报道第三章 传教士入华与西方汉学的兴起一、适应政策与“中国礼仪之争”二、法国传教士入华前的汉学研究三、法国传教士入华后的汉学研究及翻译第四章 18世纪欧洲的“中国风物热”一、“中国风”与“罗可可”二、中国物品与欧洲的装饰艺术三、绘画与园林四、“中国戏”与“中国小说”第五章 中国文化与欧洲启蒙运动一、作为启蒙运动思想材料的中国文化二、宗教与哲学三、政治与法律四、经济政策与制度下编：英、法、德三国的中国文化利用——一个以法国为中心的比较研究第六章 英、法、德“中国热”的不同特征一、西欧诸国宫廷与中国文化1．法国宫廷与决策层对中国文化的态度2．德国和英国宫廷与“中国热”二、知识界对中国文化反应的差异性1．人数与著述2．范围与特征三、“中国热”的进程与退潮1．“早恋的”英国2．德国的“中国热”及其变化3．法国：由仰慕到排斥第七章 西欧诸国“中国热”差异的社会原因分析一、18世纪西欧诸国的社会性质与特征1．从封建制度到中央集权国家2．英国：议会制度与工厂制度的形成3．法国：农本的专制主义国家4．德国：四分五裂的封建国家与邦君制度法、英、德社会状况及其对中国文化的利用1．法国对中国文化利用的取向2．英国对中国文化利用的取向3．德国对中国文化利用的取向4．民族文化品格与文化利用的取向第八章 法国知识界对中国文化的态度及变化319一、启蒙学者关于中国文化之争的目的与性质二、法国知识界对中国农业的评价及其与英国的区别三、法国知识界“由仰慕到排斥”的社会原因分析结语文化传播与文化利用367参考书目

<<18世纪中国文化在西欧的传播及>>

章节摘录

和上述国家相比，德意志可以说是一个内陆国家，直到大选帝侯腓特烈·威廉[Frederick William, 1620—1688]时才获得了临海的巴鲁伽。

查理六世[Charles VI, 1685—1740]虽热衷海外事业，但因西班牙和荷兰的阻挠难以遂愿。

直到1714年，在哈布斯堡王朝的土地上才出现了东方贸易的奥斯廷汀公司。

两年后，当飘扬着双头鹰旗的德国船出现在印度马拉巴尔海岸，各国商人大为吃惊，随即采用各种方法进行干扰，这些障碍都被奥斯廷汀公司坚持向欧陆供应廉价商品的现实主义政策所克服。

然而好景不长，查理六世为修改传统的“皇室继承法”，只得将蒸蒸日上的奥斯廷汀公司作为牺牲品。

英、法、荷诸国不仅对该公司附属的特权作了7年限制，而且又于1731年把公司6艘从事东方贸易的船削减到2艘。

此后的10余年间，德国商船绝迹于中国海岸，一直到腓特烈大帝[Frederick II the Great of Prussia, 1712~1786]时代“普鲁士国王号”的单头黑鹰旗再度出现在中国海岸。

不幸的是腓特烈大帝卷入“七年战争”，无暇顾及远东的贸易，18世纪后半叶德国对华海上贸易再度中断。

对华贸易为欧洲带去了品种繁多的中国商品。

马尼拉总督的摩加[Antonio de Morga]所列的清单包括：成捆的生丝、两股的精丝和其他粗丝；绕成一束的优质白丝和各种色丝；大量的天鹅绒，有素色的、有绣着各种人物的、有带颜色的和时髦的，还有用金线刺绣的；织上各种颜色、各种式样的金、银丝的呢绒和花缎；大量绕成束的金银线；锦缎、缎子、塔夫绸和其他各种颜色的布；亚麻布以及不同种类、不同数量的白棉布。

他们也带来了麝香、安息香和象牙。

许多床上的装饰物、悬挂物、床罩和刺绣的天鹅绒花毯；锦缎和深浅不同的红色花毯；桌布、垫子和地毯；用玻璃珠和小粒珍珠绣成的马饰，珍珠和红宝石，蓝宝石和水晶。

金属盆、铜水壶和其他铜锅、铸铁锅。

大量各种型号的钉子、铁皮、锡和铅；硝石和黑色火药。

他们供给西班牙人小麦粉、橘子酱、桃子、梨子、肉豆蔻、生姜和其他中国水果；腌猪肉和其他腌肉；饲养得很好的活鸭和阉鸡；大量的新鲜水果和各种橘子、栗子、胡桃。

大量的各种好的线、针和小摆设、小箱子和写字盒；床、桌、靠背椅和画有许多人物、图案的镀金长凳。

他们带来了家用水牛、呆头鹅、马和一些骡和驴；甚至会说话、会唱歌、能变无数戏法的笼鸟。

中国人提供了无数不值钱，但很受西班牙人珍重的其他小玩意儿和装饰品；各种好的陶器、制服、珠子、宝石、胡椒和其他香料，以及我谈不完也写不完的各种稀罕东西。

在这些销往欧洲的中国商品中，茶、纺织品、瓷器、漆器等，无疑是最受欢迎的。

新航路开辟伊始，丝绸就成为各国商人竞相收购的对象。

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写道：“葡萄牙人最乐于装船的大宗商品莫过于中国丝绸了……住在菲律宾的西班牙人也把中国丝绸装，他们的商船，出口到西班牙和世界的其他地方。

”1608年荷兰东印度公司董事会指示在印度的商站要特别努力展开对华贸易，以取得大量的生丝和丝织品。

首航的考克斯合恩号船就载了570件丝织品返回泰瑟尔。

在法国，中国丝绸“像洪水一样涌进巴黎和各省，”以致政府不得不采取措施保护本国的丝绸工业。

荷兰、法国、瑞典、丹麦等国每年进口的丝绸一般多为数千匹，高的时候可超过2万匹。

英国作为一个本土丝绸业发展较晚的国家，对丝绸的需求量很大。

1704年“肯特号”所载丝织品占回程货物总值的63%。

1760年前，英国进口的甲国丝绸一般每年1—2万匹，多时可达3万匹。

乔杜里[K. N. Chaudhuri]提供的1677年至1760年间的统计数据表明，英国东印度公司进口的丝绸总量近60万匹，年平均进口接近1.5万匹；2中国海关材料显示，1750年经粤海关输往欧洲各国的丝织物，

<<18世纪中国文化在西欧的传播及>>

英国为5640件，法国为2530件，荷兰为7460件，瑞典为1790件，丹麦为809件，合计为18329件。

3总之，18世纪中叶西方各东印度公司的丝绸年进门总量最多可达75000余匹。

这些外销的丝绸有面料也有成品，包括窗帘、床罩和服装等。

其样式有国内市场通行的，有适合欧洲市场专门设计而具欧洲风味的，有在装饰风格上体现中西合璧特色的，也有典型的清代装饰图案。

欧洲人真正使用中国瓷器是从达·伽马的航船返回里斯本开始的(图6)。

最早从事华瓷贸易的葡萄牙人非常重视这种商品。从1552年的记录来看，瓷器占贸易总额的1/3。

他们除了进口一般的中国瓷器外，还定制欧洲样式的瓷器。

1602年和1604年荷兰人两度劫掠葡萄牙大帆船，将船上瓷器运往阿姆斯特丹拍卖。

此次拍卖使瓷器在欧洲的声望骤升，需求量急速增大，从而进一步刺激了欧洲的华瓷贸易。

我们很难对18世纪中国瓷器销往欧洲的总量给出精确的统计，但可以从某些国家在一段时间内进口的中国瓷器看出贸易规模。

据戴维斯[D. w. Davies.]估计，在1604年到1657年的半个世纪间，荷兰销往欧洲的中国瓷器不少于300万件。

到18世纪，随着瓷器使用在欧洲的普及，瓷器贸易有进一步发展。

1720年之后的半个世纪，销往英国的华瓷达到2500—3000万件。

在荷兰对华间接贸易时期，英国华瓷贸易不仅供应本国市场，而且大量从事转口贸易，甚至连荷兰都可以看到英国商人的瓷器销售广告：1722年之后的25年间，法国进E1的华瓷约为300万件，在1761年至1775年间又进口200万件。

据凯尼斯[J. P. Kemeis]与布朗恩[Y. Brunean]称，丹麦东印度公司仅1730年华瓷销售订单即达1000万件。

瑞典是华瓷最重要的客户，瑞典第三东印度公司在1766年至1786年间进口华瓷达1100万件。

在其存在的84年间，总共进口约5000万件，居各国华瓷贸易之首。

欧洲的远东贸易对欧洲历史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在将中国商品大量运往欧洲的同时，也将中国文化带到了欧洲各国。

瓷器、丝绸、漆器、壁纸等丰富多彩的中国物品，成为中国文化西传的载体，向欧洲展示了神奇迷人的中国文明。

二、17世纪前葡萄牙文和西班牙文中国报道欧洲远东贸易的兴起和商人、旅行家及从事殖民外交的官员的到来，关于中国的消息，经由大海而不是原先的陆路，以远超过马可·波罗时代的规模，通过信件、报告、传闻和行记被带往欧洲。

1515年柯尔萨利斯[Andrew Corsalis]首先打破了自曼德维尔之后长达两个世纪的沉寂。

他在致洛伦佐·美第奇公爵[Lorenzo Medici]的信中送去了中国消息：中国人生产“丝绸和各种精致的面料，如锦缎、缎子和极其富贵的织锦。

虽然他们由于眼睛小，在外表上比我们难看，但事实上他们技艺非凡，和我们具有同样的品质。

”

<<18世纪中国文化在西欧的传播及>>

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全球一体化进程为我们审视17、18世纪中国与欧洲的文化交往提供了新的视角。当我们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深切感受到多元文化碰撞和互渗在人类文明发展中的作用。或许正是这样一种意识，使得该研究领域备受关注，它所包含的两个方向“‘中国热’中的欧洲”和“欧洲在中国”都取得了重要的进展。

从学术史的角度看，本书所关注的前一方向似乎更多受到来自意识形态和国际政治格局的制约。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相对和平时期，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西方学者、中国学者和日本学者都有活跃的学术表现，出版专著的数量为此后三十年间著述总数的一倍以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期间这一领域的研究进入低谷，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东方，整个20世纪50年代几乎看不到任何有分量的著作问世，直到20世纪60年代开始才出现复苏的迹象，著述数量逐渐增加。从1974年开始，在法国尚蒂伊多学科研究中心[centre de Recherches interdisciplinaire de Chantilly]每三年召开一次有法国、德国、比利时、意大利等国中国问题专家参加的国际汉学讨论会，“中国文化对西方的影响”是会议的基本议题之一，例如前几次会议的主题都涉及到“17—18世纪中国同欧洲(主要是同法国及其他主要国家)的交往关系，尤其是中国对它们的影响”，包括“哲学影响”、“来自中国的艺术和科学”和“礼仪之争”等方面。

1其他类似的国际会议也时有举行。

进入90年代，该领域研究呈现出繁荣景象。在欧洲和美国有一批重要的著作问世，所涉及的内容无论在专题分析方面，还是在综合性的研究方面，都有重要的突破。

2更具有意义的是，研究中西关系史的中国学者开始改变原先主要局限于“西学东渐”研究的局面，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涉足“中学西被”的领域。

我们知道，在中国，长期以来对“中国文化对西方的影响”或“中学西被”这一方向的课题很少有人问津，与“西学东渐”的研究相比，无论参加的人数，还是研究的成果都要少得多。

例如，在关于欧洲社会的“中国热”以及18世纪欧洲盛行的“中国风”，西方已经出版了四五种名为《中国风》[Chinoiserie]的著作，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探讨中国艺术风格对18世纪欧洲艺术和社会生活的影响。

而在中国，一直到现在都不曾有部这方面的专著。

这种状况不仅与西方汉学界在该领域取得的成就不成比例，而且也与历史上中国文化对欧洲乃至世界的贡献不相称。

造成这种现象也有资料方面的原因，因为该方向的研究，无论文献资料还是实物资料，都主要集中在西方的档案馆、博物馆和图书馆；文献资料所涉及的语言包括拉丁语、葡萄牙语、西班牙语、法语、英语、德语和意大利语等，而且非常分散。

这给中国学者的研究带来很大困难。

早期从事这一方面研究的多为在欧洲的留学人员，如范存忠、陈受颐、李肇义、陈铨、钱钟书等，文章大多用外文写成。

随着70年代中国实行开放政策，中国学者开始有机会到各国的图书馆、档案馆查阅资料，到博物馆观看实物，部分重要的西文原始材料和近人的研究成果也陆续翻译出版。

同时，随着开放意识的加强和全球一体化进程中对多元文化格局的重视，社会公众和学者对文化间交流的重要性有了更明确的认识，这些都给该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机会。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对“中学西渐”或“中国文化对欧洲之影响”的研究给予了越来越多的重视，在多方面取得了重要的进展，逐渐成为学术界的热点。

这十年间所出版的著作比此前所有著述的总和还要多1，同时有关论文的数量猛增，并出现了多种专门性的刊物。

.....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